导论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思路

“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论题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供给边(supply-side)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来探寻（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路。本书之所以选择从供给边来研究经济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特质、西方流行经济理论所存在的误区和其‘力不能及’的缺陷,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目标。

一、发展经济学的重心是对供给问题的研究
—— 理论史的简要回顾

劳埃德·G·雷诺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是确定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增长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以及总的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这一论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已经给出了发展经济学本身向何处去的初步答案。① 就生产要素的供给而言，在二战之后发展经济学“短暂的繁荣”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将资本形成问题作为研究的重心，并强调资本形成及其效率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比如，罗斯托在其“起飞”理论中将经济发展呈“起飞”状态的首要条件归结为资本积累率要达

① 劳埃德·G·雷诺兹:《发展经济学的要点》,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 10% 以上。

刘易斯在运用和遵循“古典学派传统”① 去探寻和研究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发展道路时,强调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资本的使用”,当“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资本再投资于形成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自给农业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的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②。不仅对资本形成如此重视,刘易斯还将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劳动供给结构的转型过程,归结为一个农业劳动力不断释放而不断形成真实的现代部门劳动力供给,直到最后在两大部门中劳动力供给结构呈均衡状态的过程。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的重心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的最基本原因在于资本供给以及投资引诱的能力不足。就供给边而言,极低的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由此而引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则使生产率难以提高,并进而造成低收入的僵化与停滞状态。与纳克斯并行的另一位持平衡(均衡)发展(增长)战略主张的罗森斯坦—罗丹,在其代

① 参见阿瑟·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见《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刘易斯认为,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说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古典学派”源自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一方面承认‘古典学派’是马克思的创造,承认古典学派经济学是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济学,但又将‘古典学派’的队伍扩充至马歇尔、艾奇沃斯乃至庇古,自称是犯了‘文法错误”,其实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阶段的科学的划分原则。

② 同上,第 6~7 页。

表性模型‘大推进’理论中,对资本形成(供给)的重视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其主要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而“最小量投资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①。“大推进”的形象含义正像飞机飞向空中之前的最小临界地面速度所需提供的推进力，只有以一定量的投资(资本形成)作保证,在多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部门都成长起来,才能克服不可分性,产生互相依存、互为市场、内在地消除储蓄缺口的经济发展格局。事实上，罗森斯坦一罗丹在强调大量资本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时，是以供给平衡为中心主题的。

赫希曼作为非均衡(不平衡)发展(增长)战略的代表者,对罗森斯坦一罗丹的理论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②。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大量而全面的资本形成，而是经济中如何使短缺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率，如何使投资形成足够强劲的联系效应——前向联系效应与后向联系效应。赫希曼更看重后向联系效应，“后向联系效应要比前向联系效应更整齐”。这正是对经济运行机制中供给的决定作用的清晰认识。赫希曼还指出，在后向联系效应展开的过程中，“投入供应、衍生需求”的“经济活动将导致通过国内生产提供其所需投入

① 保罗·罗森斯坦一罗丹:《自然在飞跃 非均衡增长过程分析》,见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5 页。

②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 页。

的意图'[①]。总而言之,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坚持在注意要素(特别是资本)供给的同时,要注重供给机制。

熊彼特早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就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②],并将'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③];"新的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给作不同的使用"[④]——这是熊彼特为"发展"提供的第二个定义。他不同意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注重储蓄且倚重相应的投资数量的增长,进而认为"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⑤]才是改变经济世界面貌的源泉。换言之,熊彼特在批评传统理论以及预见现代发展理论的"唯资本论"特色的同时,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的决定作用与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供给边的创新机制以及创新过程展开与实现背后的制度基础。一般而言,人们认为熊彼特笔下"创新"的含义偏重于技术创新,而对制度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至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承继者,如爱得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赛·施瓦茨、理查德·列文和海纳等人。但是,正如张培刚所评价的那样,熊彼特不仅强调生产技术革新,而且还强调生产方法的变革,"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对经济发展

①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②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3页。

④ 同上,第75页。

⑤ 同上,第76页。

的作用①。斯威齐认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评价由熊彼特本人作了清晰的表白。他说：“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当然容不得熊彼特去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表明，熊彼特本人的理论探索之路确实也“折回”到对制度因素的重视上来了。

应该看到，发展经济学在其繁荣时期，并没有遵循由熊彼特开辟和倡导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向前发展，而陷于“唯资本论”以至于不能自拔。英国伦敦大学拉尔在 1983 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点名批评了赫希曼、纳克斯、钱纳里、缪尔达尔、刘易斯、普雷维什等一大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并声称：“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③。G·拉尼斯在《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一文中也慨叹道：“发展经济学正处在二次大战后取得了重大进步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中译本序言第 X 页。

② 熊彼特：《从马克思至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 页。

③ D·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伦敦经济事务所 1983 年英文版，第 109 页，转引自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的‘收益递减’阶段。’[①] 如何使发展经济学从衰微走向复兴？拉尼斯认为,在其未来方向中“政治进程——政策通过它不是适应就是阻碍经济体制走向增长——是问题的关键”,并‘按照它们(这里指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笔者注)克服不可避免的对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制约因素的能力之间的差别去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②]。拉尼斯的感觉是有预见性和代表性的。其潜在意蕴是，在发展经济学或探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性征与规律的过程中，要重视制度资源及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会注意到这里的‘制度’是广义的,不仅如此“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可以被归结于广义供给范畴之内,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需求无所不在。

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对制度的重视在其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是时隐时现或者说没有间断过的。在刘易斯撰写名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同一年(1954 年),他也写就了名著《经济增长理论》。他注意到“某些制度或观念可能与增长是一致的,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一致”,并专设一章‘经济制度’[③],来论证“制度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④]。不过，作为对经济发展的狭义要素“供给”极端重视的代表者，刘易斯在研究制度变迁

①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第 25 届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精选:《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第 11 页。

③ 该书除导论外,共设六章,其他章节包括“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参见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④ 同上,第 65 页。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还声称其研究结论“决不是表明制度变迁是经济变化的首要或惟一的原因”①.

与刘易斯同于 1979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W·舒尔茨,这位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批评了传统的‘资本形成”概念的狭隘性,他在其广义资本观中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并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从微观（个人）角度看，“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人是完全无依无靠的”②。从宏观（社会)角度看;“除非通过人力投资使人的能力显著地提高,低水平的产业必定会与极其僵硬的经济组织同时并存’③。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表明，舒尔茨以其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心，重视制度与组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或阻滞力量。最集中地体现这一思想观点的莫过于他 1968 年在《美国农业经济杂志》12 月号上发表的《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的经济价值》这一论文。舒尔茨提出了制度资源的分类④，指出经济发展需要也引起制度资源的衍生与变化，批评了经济发展在适应人力价值增长过程中的制度滞后⑤。不过,舒尔茨的局限在于他考察制度的发展功能时始终将其目光盯在人力资本方面而基本不旁及其他必要的研究。

与制度因素研究相关联并富有自身特色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在 1973 年出现，二者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分别是罗纳

①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第 176 页。

②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 页。

③ 同上,第 19 页。

④ 同上,第 30 页。

⑤ 同上,第 36 页。

德·I·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爱华德·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以“金融抑制论”为例,麦金农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强调了实质资本及其他“实际”要素的不足对发展的阻滞作用，而几乎排除了金融要素（除了对进口能力的外汇限制的讨论之外）。他没有局限于注重资本的稀缺，而是集中关注在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上普遍可见的严重性扭曲，这种扭曲有其深刻而具体的制度归因，即在金融制度中，金融当局硬性规定最高存款与放款利率，使利率不能正确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或匮乏的现象；同时，金融当局未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而使名义利率(d)无法补偿通胀率 P^* ,以致实际利率($d-P^*$)成为负数,最后导致“货币需求(广义上包括定期存款以及活期存款和通货)与国民生产总值成比例下降”[①]。如果按照正统经济理论及传统发展理论中“强制储蓄一通胀方式”去理解的话,麦金农对“金融抑制”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一结论似乎有利于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供给形成机制，因为货币似乎是实际资本的替代品。货币需求与国民生产总值成比例下降自然会使经济中的投资率上升。但是，麦金农对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分析的最富有创意，也是最重要和新颖的贡献正在于他所强调的分割经济中货币与实质资本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在资本市场完善条件下货币与其他资产（包括实质资本）之间所存在的替代效应。麦金农认为，在货币需求函数($M/P)^D=L(Y,I/Y,d-P^*$ ）中，所有的偏导数都是正数，“尤其是$\partial L/\partial(I/Y)>0$，从而表明了分割经济中货币同实质资本

① 罗纳德小麦金农：《欠发达国家的利率政策 金融自由化的回顾》,转引自《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8 页。

的基本互补性’①。

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LCDs）的经济发展为己任，有其繁盛，有其衰微，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之途中深刻地把握和探索其内在的机制与规律从而带来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它绝不是拉尔笔下的死寂归途。正如张培刚先生所说“发展经济学不仅不‘趋于衰落’、‘濒于死亡’，而恰恰相反，应该是任重道远，前途大有可为。……必须对现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连同研究方法，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② 从本书的视角看，以“有效供给”为中心来研究经济发展应该是复兴发展经济学所必需的。

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杰出代表是萨缪尔森，主流经济学则是萨缪尔森所称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萨缪尔森认为，古典经济学衰败之后，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为目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③。当新古典综合学派难以解释 70 年代以来西

①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66 页。

② 谭慧：《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0～191 页。

③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27 页。

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难题的时候，其他旨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流派纷纷产生并力图构筑自己的体系且进一步提出种种对症之策。在据称是作了“最彻底的一次修订”的《经济学》第十二版中，萨缪尔森企图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总合在一起”，并称之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①]。

不管是旧综合，还是新综合，它们所依赖的是所谓的“混合经济”，其理论体系的内核仍然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之后，其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辩护，并说明总产出（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波动的决定因素。由于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思想家”们所普遍存在的怀疑与“叛逆”精神使然，凯恩斯找到了“总需求函数”，以“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来解释经济运行。凯恩斯抨击传统古典经济学置总需求函数于不顾；在马歇尔、艾奇沃斯以及庇古教授手中，古典学派理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在三人的著作中，对于有效需求，竟未提及只字[②]。所谓“有效需求”，它取决于消费倾向（X）和投资量（D_2）（资本边际效率）。“有效需求”乃是“就业通论之要旨”[③]。这是因为，“均衡就业量决定于（Ⅰ）总供给函数 $\emptyset$，（Ⅱ）消费倾向 X 与（Ⅲ）投资量 D_2”[④]。而凯恩斯在假定技术、资源与成本三者不变的情况

①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序言第 2 页。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3 页。

③ 同上，第 28 页。

④ 同上，第 30 页。

下，将供给或所得归因于就业量的变动，$Z=\emptyset(N)$。其中，就业量 $(N)=\Sigma N_r=\Sigma F_r(D_{Wr})$（$N_r$ 为 r 产业中的就业量，D_{wr} 为 r 产业中的有效需求）。凯恩斯假定对于任意的 r，均有 $D_{wr}=D_w, D_w$ 为总有效需求。这样，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总供给或国民所得也就取决于有效需求。至此，凯恩斯已经全然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他反其道而行之，将需求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置于决定性或支配性地位之上，即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而是需求决定供给。

以凯恩斯主义为其理论内核的新古典综合派自然要承继凯恩斯的衣钵，从而宣扬总需求是产出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且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总需求变动引起的"[①]。"周期可以以最好的方式理解为总需求的变动，它反映着 $C+I+G$ 的变动"[②]。

问题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之事丝毫无补。经济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增长或者说是在既定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构状况下考虑到人口因素后的广义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其本质的规定性主要是制度与结构的良性变迁——变化与改进。制度与结构变迁的基本和主要的反映方式是国民经济潜在产出能力的增进以及相应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对经济发展的内涵的界定还仅仅是针对"经济增长"而展开的广义层次上的经济发展，如果将经济发展的内涵的界定落实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话，那么，与制度与结构变迁相伴随的经济发展更具其明确而现实的指向。托达罗指出："经济发展一词是在经济不断增长

①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8 页。

② 同上，第 33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背景下按照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的削减克服而被重新定义的。’① “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② 张培刚先生将经济发展（狭义的）视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并在其借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提出五大“发动和定型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因素”：①人口——数量、组成与地理分布；②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③社会制度——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权的分配；④生产技术；⑤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改变已有的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③

总之，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经济理论所需正视的是制度与结构的变迁、消除失业与贫困乃至不平等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动与制约因素及其整合，等等。这些重要方面，它们是作为经济运行的“慢变量”或长期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它们也多半是属于经济运行的‘供给边’的用主流经济学的独特语言讲，它们又基本上是以如何使潜在产出长期增长作为主要分析内容的。无疑，主流经济学，当它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其内核时，面对着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它是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局限性的。在对二战以后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实质上的折衷形式上的“新综合”时，萨缪尔森不得不承认，就经济分析中强调总需求的变化的方法

①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② 同上，第 79 页。

③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文本），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2～85 页。

而言“尽管这种方法对非常短期来说是合理的,但它对长期来说,肯定会造成严重的误解。从比较长期的观点来看,推动经济在几十年内增长的因素是潜在产出和总供给……而不在于某一年总需求的特定位置”①。

承认归承认,对潜在总产出与总供给的全面分析并未真正地被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去。其代表学者们有意将总供给与对周期波动的分析联结起来,进而用经验规律——“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总需求变动引起的”② 来削弱总供给分析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本应有的地位;他们在与以拉弗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就有关经济政策及其效应进行争论时,按照其在“需求模式”下的惯性思维认为,“供给方面减税的主要影响来自它们对于总需求的影响,而不是来自它们对于总供给的刺激”③。于是,经济活动的迅猛发展是由供给学派名义下的需求方面的增长所推动的。

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使主流经济学接纳了供给学派有关经济运行供给边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也还不能成为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解释。

这首先是因为长期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在长期尤其是中期经济增长中,对于既有的潜在总供给而言,我们从来都不应否认来自于总需求的“拉力”对于填平较低水平的现实总供给与较高水平的潜在总供给之间的缺口的重大作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得以盛行的现实基础。但我们所关注的是如何使未

①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1 页。

② 同上,第 308 页。

③ 同上,第 312 页。

来的潜在总供给突破既有的较低水平的界限。其时，经济发展变为了前提，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内在的结果。

其次是因为潜在总产出和总供给的决定不等于潜在总产出与总供给自身的扩张。诚如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潜在产出的总供给决定因素的问题是由‘增长理论’来研究的”①。其时，仍然可能只对问题用短期与静态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归因于需求（有效需求）的支配作用；“潜在产出”作为一个抽象而无法具体化的范畴似乎也完全可以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构框架下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准确”地加以计算。潜在产出与总供给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指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所作的远离原点的向外推移，而不是指在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被“框定”时，如何使现实总产出从边界与两个坐标之间的区域内的任意点向边界“逼近”。前者是长期的，而后者是短期的。前者的实现主要来自于供给的制度与结构变迁的实在力量，而后者可以在既定的制度与结构背景下得以实现；前者是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而后者则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寻求答案，不必顾及来自于供给边的影响。② 在经济分析引入货币因素之后，名义总供给可以超越潜在总供给（生产可能性边界），只不过在这种“超越”中的必要条件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设潜在总供给为 $S_m = Y_m$，现实总供给在 $t-1$ 期和 t 期分别是 $S_{t-1} = P_{t-1} \cdot Y_{t-1}$ 和 $S_t = P_t \cdot Y_t$，假定 $S_{t-1} \leqslant S_m$，而 $S_t > S_m$，尽管 Y_{t-1} 与 Y_t 均小于 Y_m，但物

① 保罗·A·萨谬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1 页。

② 保罗·克雷·罗伯茨：《供给学派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价水平的攀升完全可以使 $P_t \cdot Y_t > Y_m$。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在温和的通胀状态下，价格水平的上涨可以导致一定的实际产出的提高，即当 $P_t > P_{t-1}$ 时，有 $Y_t > Y_{t-1}$。但 $P_t \cdot Y_t > Y_m$ 至少在理论上或在纯逻辑层次上并未排除如下情况，即在价格水平上涨的同时，实际产出下降，但名义总供给仍可以“超越”实际总供给，即 $P_t > P_{t-1}$，$Y_t < Y_{t-1}$，但 $P_t \cdot Y_t > Y_m$。这种逻辑规定性被西方国家 70 年代的“滞胀”(stagflation) 现象“演绎”出来，但是，主流经济学无法用其理论内核来解释“滞胀”现象，因而陷入了迷惘。

再次，供给学派固然由于其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边，并且由于其与里根经济政策的深厚联系而名噪一时，从而在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占了一席之地，但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片面地理解了“供给边”的内涵。该学派虽然也强调要进行制度变革（这里主要是指以削减边际税率为核心的税制改革），但对“供给边”内涵的基本界定大多仅限于劳动的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问题在于，就是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派也由于强调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而必然在其理论体系与政策工具库中要涉及到税制问题。不同的是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有关“减税”的实质与指向，正如保罗·克雷·罗伯茨所说，“供给学派不强调税收对政府开支的影响，而指出税收能直接影响商品与劳务的供给”，较低的税率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的刺激。显而易见的是，供给学派注重政策与制度变迁的供给边效应，但又将之仅仅归结于税制。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为增加有效供给、形成有效供给机制，税制的变革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小部分。

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理论应注重‘供给’,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其经济理论应保有‘过渡’特色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①] 面对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应该毫不松懈、不遗余力,并勇于创新。时下，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的时候，往往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持“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去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特质，从而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理论自身的特色减弱了。本书认为，成功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理论固有的特色。这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借鉴已有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和科学的内容与方法，同时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而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但它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直至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与目标。我们认为，注重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立有效供给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是具有不同寻常

①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求是》杂志 1996 年第 13 期。

的意义的。首先，既有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以有效需求理论为中心。西方既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固然注重对供给问题的研究，但是，它仍深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偏斜于“需求边”。因而，确立供给理论的应有地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需的。

其次，工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均与有效供给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社会有效需求水平的提高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从需求的角度看，工业化过程中主导产业的生成、发育、成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来支撑；市场化意味着要素与产品的基础配置方式是市场配置，而这必然需要市场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张(比如,特别典型的是住宅商品化问题)而国际化也要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有限的国际需求中探索和寻求国际比较利益。另外，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结构性的需求膨胀(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仍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需求的总量与结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有效供给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显得更为重要。工业化过程是主导产业系列成长、变迁和相继更迭的长期过程，它并非取决于市场规模，而是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技术创新、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产业组织的整合效率等诸多“供给边”因素。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具有其特殊的内容，那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实质是制度资源(供给)的开发(“生产”)与利用。在新体制的构建过程中，我们确实对制度与规则具有强劲的需求，但没有相应的制度资源及其成功“嵌入”，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仍然只能处于需求阶段。国际化的实质在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